

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历史演变与科学内涵

兰 池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逐渐形成了成熟的和平外交思想,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外交事业的发展。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同中国实际、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有一个产生和形成的过程,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论准备阶段,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日臻完善。其中,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以和平促建设,以建设求和平”,“中间地带”理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等,都是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科学内涵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理论渊源;历史演变;科学内涵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7)01-0032-06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7.01.006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Mao Zedong's Peaceful Diplomatic Thought

LAN Chi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Faced with the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Mao Zedong summed up 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and formulated his peaceful diplomatic thought, which has greatly promoted China's ties with other countries. His peaceful diplomatic thought was the produ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and Chinese realit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has profound theoretical basis. Mao Zedong's peaceful diplomatic thought emerged in the period of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was perfected during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dependence and peaceful coexistence", "promotion of construction through peace and establishment of peace through construction", "intermediate zone" and "three worlds" are major components of Mao Zedong's peaceful diplomatic thought.

Key Words: Mao Zedong; peaceful diplomatic thought; theoretical origin; historical evolution; scientific connotation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6CKS005)

作者简介:兰池(1991—),女,山西怀仁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与建设研究。

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关注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以一个战略家的世界眼光,提出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外交战略思想。其中,以“和平为上”为核心理念和最高旨趣的和平外交思想,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归纳和梳理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过程及其具体内容,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科学内涵。

毛泽东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形成的和平外交思想,为新中国外交奠定了理论基础、拓展了实践空间。渴望和平、争取和平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表达,也是长期以来我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1]。这些都与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基本内容一脉相承。尽管我国外交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侧重,但始终离不开“和平为上”这一现实指向,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具有巨大的时代价值和历史贡献。

一、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理论渊源

(一)内生源泉:中华民族传统的“和”文化

在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关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先秦诸子百家作为中国思想发源的主体大都推崇“天人合一”“调和”“持中”的和合思想。孔子讲“和而不同”“和为贵”,老子讲“知合日常”,荀子讲“天地合而万物生”,管子讲“和合故能谐”,《易经》讲“保合太和”,都强调和谐乃万物生长的规律。和合的

精神特质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深深地熔铸到我们的民族性格之中。中国自古以来就提倡“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和“协和万邦”的思想,这种“天下主义”情怀成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文化根基。非攻、兼爱、和谐、互利这种包容兼蓄的优秀文化传统,不但规范着中国民众的行为,而且指导着我国从古到今的外交行为。

毛泽东历来倡导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对于中国传统和平文化也不例外。在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中,均可见到中国传统的“和”文化对其外交思想的深远影响。例如“和平为上”“争永久和平”“和平共处”“人民外交”等提法,无不闪烁着我国传统和合文化的光辉。中国传统和平文化无疑是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理论源泉。

(二)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

主张和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突出的价值取向和理论主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了这一理论特质并且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地加以创新。毛泽东外交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同时,毛泽东外交思想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外交领域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对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的和平外交思想正是以“矛盾双方互相依存、互相转化”“分清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等矛盾学说为哲学依据。在毛泽东看来,一切矛盾着的事物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战争不仅可以转化为和平,而且为了和平也可以支持“正义战争”,正所谓“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哪有‘和平’二

字”^[2];要正确处理好“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之间的矛盾,处理好“愿意同所有国家合作”和“区别对待”之间的矛盾;此外,还要以“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联合、斗争、联合”“以斗争求团结”等作为我们外交活动的策略原则^{[3]4}。

二、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准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外交探索,是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早期酝酿和实践准备。这一时期的外交活动,虽不是国与国之间严格意义上的外交,但又带有外交的性质,是半独立的外交。面对变幻莫测的国内国际形势,毛泽东适时开展民间外交以促进官方外交,积累了一定的外交经验。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及时总结经验并将其提炼为理论精华,其和平外交思想得以酝酿。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一时期的主题是革命外交,但和平主义仍然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准则。其外交思想并非为战争与革命而生,而恰恰是为了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不仅指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外交实践,而且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制定外交政策和开展外交实践奠定了基础。

(一)土地革命时期:求独立、求主权

20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参与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起草,最早提出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它具体规定了“以从帝国主义榨压之下解放出来为目的”“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以及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平等”原则,这可作为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最早萌芽。可以看到,求独立、求主权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核心要义,它集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想要摆脱受压迫受欺侮的“弱国外交”的良好愿望。

此外,《大纲》第十五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对于凡因革命行动而受到反动统治迫

害的中国民族以及世界的革命战士给予托庇于苏维埃区域的权利,并帮助和领导他们重新恢复斗争的力量,一直达到革命的胜利。”^[4]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加之中国共产党时值幼年缺乏经验的客观事实,此规定虽有“世界革命”和“输出革命”之嫌,但也体现了在世界上建立最广泛统一战线的外交构想。这一外交主张建立在反对霸权主义、消除帝国主义侵略的基础之上,不失为一种大处落墨的胸怀和战略眼光,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成熟的和平外交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抗日战争时期:求世界的和平、求永久的和平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努力冲破国民党政府的种种禁令和约束,力争开展独立的外交活动。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3]16}。这表明,我们不仅需要在国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要争取世界和平的力量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他强调,“中国的外交,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5]355}。抗战爆发后,毛泽东积极号召包括英、美帝国主义在内的国家组成反法西斯联盟。他先后接见了多名外国记者、世界学联代表团及美国军事观察组等,希望热爱和平的世界人民能够一致抗日。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颁发了其第一个正式的外交工作文件——《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确定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外交基本原则。

抗日外交以谋求和平为核心主题,主张“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题为《论持久战》的演讲。他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同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我们的战争是神

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5]474-476}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又一次重申,“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3]43}。

(三)解放战争时期:和平是世界的主旋律

1946年4月,毛泽东针对蒋介石发动国内战争的现实以及国民党设想“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等错误估计,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指出“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6]1184}。1947年12月,毛泽东发表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讲话,再次强调,“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3]64-66}。毛泽东坚信,“即使有战争,我们也可以把它推迟,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地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3]213}。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为筹备建立新政权,积极开展“建国外交”。此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已经开始。一方面,美国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与遏制,竭力阻止新中国的成立;另一方面,随着国民党的溃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变得更加明朗。因此,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方针主要是,积极争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支持,并继续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主张世界和平、反对发动世界战争。

三、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理论成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一)以和平促建设,以建设求和平

新中国成立之初,刚刚经历了千疮百孔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的首要任务即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毛泽东认为,民主革命胜利后的中心任务就是搞建设。1961年10月,毛泽东在同尼泊尔国王的谈话中讲到:“我们的国家还是个穷国,要搞得好一些至少要几十年。蒙哥马利元帅说需要五十年时间,我说至少要五十年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欧洲、美洲花了几个世纪才到今天这个程度,我们用一个世纪超过就算好了。”^{[3]480}

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以推动现代化建设成为我国外交的首要目标,这也是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动力。可以说,以和平促建设,以建设求和平,和平问题与建设问题如同一对孪生兄弟密不可分。一方面,我国的一系列外交活动为经济建设营造了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和平为上”;另一方面,经济建设为我国和平外交的开展及国际地位的提升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毛泽东强调,我国想要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首先需要和平的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7]。1954年12月,毛泽东在同缅甸总理谈话时表达了我国“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朋友”的良好意愿^{[3]179}。1956年毛泽东又一次表示:“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8]

(二)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统一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和灵魂。他反复强调:“中国必须

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中国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6]1465}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认识到同旧中国一切不平等的外交发生决裂、争取自主外交的必要性。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既不认可国民党政府与其他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也不承认旧中国屈辱外交下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就为新中国夺得了独立自主的外交主动权,并在国际上赢得了尊严。

实行对外开放,争取世界对中国的支持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提出我国的外交政策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我国国情和国际力量的对比,毛泽东又强调我国应积极对外开放,增强同世界的联系。一方面,全世界热爱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反战争、反侵略、反霸权和反控制的国际统一战线;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出现了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趋势,各国经济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程度越来越高。因此,抓住机遇、加强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势在必行,从而实现共赢并在国际关系中把握主动权。另外,毛泽东还号召我们积极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交流经验、互通有无。不仅要向苏联和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还要向西方学习,“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他表示:“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它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3]394}

(三)坚持和平共处与求同存异相统一

早在1949年6月召开的新中国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就向世界宣告,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愿意同任何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3]1466}。1949年10月1

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指出:“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的任何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3]116}国家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在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平等相待、和平共处。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世界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相互对立的冷战格局。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秩序,毛泽东精炼地将其概括为“冷战共处”,指出“冷战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坏的一面是它有可能转为热战,好的一面是有可能转为和平共处。所以,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向好的方面做转化工作”^{[3]423}。可见,尽管受冷战思维的影响,但和平共处仍然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和战略目标。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致电刘少奇、周恩来:“如果资本主义国家公开宣布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则我方去电该国,叫他派代表来华商谈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3]234}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明确表示“不同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7]。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和平竞赛来达到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目标。

与此同时,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也是毛泽东和平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1955年6月,毛泽东同南斯拉夫驻华大使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强调共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可以慢慢地谈,可以展开讨论。如果不能得到一致的意见,那可以放在一边,以后再谈,不使它妨碍彼此的关系。”^{[3]215-216}同年10月,毛泽东在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时又强调:“我们之间的社会制度虽然并不一致,但这个不一致并不妨碍我们相互的尊重和友谊。”^{[3]222}

(四)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中间地带”的伟大战略构想,号召美国人民和一切受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走狗的进攻。他认为,“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来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3]590},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个“中间地带”包括三种性质的国家:第一类是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第二类是没有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三类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这些国家已经或者正在争取民族解放。它们不站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任何一方,是保持中立立场的民族主义国家。这个“中间地带”也成为后来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中第二、第三世界的理论雏形。1962年1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友人时具体阐明了“中间地带”的理论内涵:世界地缘政治分为三大块,即“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之外,都算中间地带”。他同时强调,“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存在四种类型的国家^{[3]487}。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9]343-344}。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同日本社会党人士谈话时又将北美加拿大、大洋洲归入第二个中间地带,并称整个亚非拉(第一个中间地带)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美帝国主义^{[9]345}。由此可见,毛泽东并未单纯地以意识形态为画线标准来处理纷繁复杂的外交关系,相反,他是以国家实力和地缘政治来分析国际力量对比的。其中,“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是毛泽东“中间地带”外交思想的理论主题。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外交策略一度发生重大调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实行联苏制美的“一边倒”战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中苏分歧日益

公开化,实行既反美又反苏“两个拳头打人”的“两面作战”战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又转而实行联美制苏的“一大片一条线”战略。之后,随着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开始摆脱与苏美同时对抗的局面,形成了中美苏战略三角的外交格局。诚然,无论是“一边倒”还是“一条线”的外交方针本身都存在一定缺陷,使我国的外交活动失去了灵活性和主动性,且不利于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实行。但应当指出,国际上两极对立的紧张局面和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现实,造成我们的外交战略受到很大程度的局限。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号召第三世界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3]600-601}相较于“中间地带”的外交理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将美、苏这两种完全不同制度形态的国家归为一类。可见,此时毛泽东已完全脱离了以意识形态判断世界格局的认知框架,纯粹地以国家综合实力强弱及称霸与反霸权作为划分的双重标准,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新思路。在之后的几次讲话中,他也多次强调,当今世界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博弈。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决不谋求霸权,不搞大国沙文主义,否则,“中国政府就是帝国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了”^{[9]386}。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发言,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晚年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指出,这一思想“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10]。(下转第87页)

- ism in science more broadly[EB/OL]. (2016-10-8) <http://science-for-the-people.org/secondary-lit/>.
- [2] Michael Goldhaber. Announcing the formation of a new organization of scientists dedicated to vigor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action [EB/OL]. (2014-02) [2016-07-30]. http://science-for-the-people.org/wp-content/uploads/2014/02/SftP-SESPA_founding-document-3.pdf.
- [3] 杜若.“科学为了人民”运动初探[J]. 科学文化评论,2016(2):5-22.
- [4] Bill Zimmerman. People's science in the “Racial” economy of science: toward a democratic future[C].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3.
- [5] Langdon Winner. 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 [J]. Daedalus,1980(1):121-136.
- [6] 美国科学家代表团. 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科学——美国科学家访华观感[M]. 施量,译. 香港:香港南粤出版社,1976.
- [7] 杜若. 美国“科学为了人民”运动初探[D]. 北京:北京大学,2015.
- (责任编辑:夏玉玲)

(上接第37页)

可以看出,从“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到“三个世界”的战略构想,毛泽东均是以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为出发点,将“第三世界”看成是一股独立自主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来加以团结。“中间地带”的思想,已经改变了以往孤立地以意识形态偏好认识世界格局的观点,奠定了后来“三个世界”思想的基本框架。“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又改变了世界两极体系的观念,凸显了世界多极化的面貌,为我国拓展了外交空间。毛泽东的这一和平外交思想已经大大超越了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在讨论国际关系问题时不是单纯地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而是强调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控制与反控制、剥削与反剥削之间的矛盾对立。这表明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开始摆脱极“左”思潮的束缚,重新回到以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务实轨道^[11]。这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对确立中国的国际地位,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起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15.
- [2]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74.
- [3] 毛泽东. 毛泽东外交文选[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 [4]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1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63.
-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7]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8] 毛泽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48.
- [9]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N]. 人民日报,1974-04-11.
- [11] 李捷. 国史静思录[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95.

(责任编辑:白丽娟)